

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文选

杨和平 吴佩林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文选

杨和平 吴佩林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文选 / 杨和平, 吴佩林主编.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13-6169-4

I. ①地… II. ①杨… ②吴… III. ①地方史-文献-中国-文集 ②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 K29-53 ②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8263 号

书 名 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文选

著 者 杨和平 吴佩林 主编

责任编辑 于 浩 王亚宏

封面设计 陶 雷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s@nlc.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6169-4

定 价 48.00 元

前 言

杨和平

本书系《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专栏论文的选集。笔者系这一栏目的责任编辑,借结集成书的机会,于此交代栏目相关情况及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悟。

2011年,本人奉调学报编辑部,主持行政工作,接任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不胜欣忭。一纸调令,虽不至于喜形于色,但我分明预感到多年来对这份学报的感情或可能会有别于以往的体验。

这份学报初创于1979年,当时学校名南充师范学院,学报亦因之而名《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3—1987年,我在这所学校的历史系读书,经常会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历史系资料室看到这份学报,更重要的是,经常会看到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些文学、历史、政治学科的本校老师的文章在上面发表。这些老师就在我们身边,在给我们上课。大学四年,因这本刊物而平生了许多亲切、敬仰、骄傲之情。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期刊的所谓A、B、C级一类“核心”之说,老师们搞科研、写论文也没有现在的立项资助、科研奖励,他们的学术研究无核心之扰,无报账之烦,发自内心,自然而又纯粹。现在想来,我在大学期间较早即准备考研,有志于学术,除了老师们的引导,也与受这份学报的影响有关。由于老师们的潜移默化,我也越发萌生了一种愿望,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自己的学术论文铅印于这份学报呢?

后来，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的确是在这份学报上发表的，那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于我而言，那也是挺自豪的、曾经赋予了我一定自信心的一件事儿。

1987年7月自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后，9月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初到上海，诸多不适应，如语言上的、环境上的，更多的还是学习上的。严师李巨廉教授主讲的“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重在读列宁原著（按：此语实不确，因为读的还是人民出版社的翻译本），然后按老师的问题指向提交读书报告，虽然我也认真对待，丝毫不敢怠慢，但第一次交作业就被点名批评了。过去在南充的积累与现在老师的要求差距太大，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自卑心理。第二学期后期，我的一位师兄，湖北的，是李老师门下1986级唯一一名研究生，但二年级还未结束，就被李师判定不能完成学业而要求肄业出门。作为“猴子”之一，我战战兢兢，更生紧张。

颓丧了一个暑期。二年级开学不久，我尝试着调整情绪，整理本科的毕业论文，图谋发表，希望能找回一点自信。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个题目受自王明元老师课程的启发。当时王老师给我们上了“法国史专题”选修课，其中一个专题就是“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那时候，我专心于考研，后又去上海参加面试，论文题目是面试回来后才确定的。写作本身只用了一天时间。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睡了懒觉，11点起床，吃午饭，然后去教室（今北湖校区黄葛树下二教楼最后面的阶梯教室）写论文，下午5点去吃晚饭，晚上9点左右完成。因为有王老师解析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下笔前想得比较完整。那个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非常热闹，准备研究生考试专业课的过程中看了国内学者不少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思路、资料上都胸有成竹。论文交上去后，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后来收录在了学校刊印的《南充师范学院学生毕业论文选（八三级）》中，那也算是我那篇论文的首次铅印。按现在的水准和要求，那文章并不怎么样，但当年，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只有一点遗憾，论文的第二部分，关于1812年战争，当时在南充，确实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在文本表述上与其他部分风格有异，明显底气不足。当时，我在稿子上还特别做了注释：“关于1812年战争的研究在

史学界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受条件的限制，我也不能对它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钻研，写在这里的文字仅仅是学习前辈既得的研究成果的一点体会，意在保持本文研究专题的完整性，同时也希望以此引起史界的重视和各位前辈专家的教诲。”

但是，到了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资料室，这就不是问题了。于是，我找了一些资料，把关于1812年战争的部分内容替换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本，然后用500字1页的方格稿纸抄录后寄给王明元老师，并请转投给母校的学报。令人欣喜的是，论文很快就在学报1989年的第2期上刊发出来了。当年，学校已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也就随之而更名为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现在看当年发表出来的文本，除勾起一些怀念之外，最不能接受的是文末注释中的英文错误，原因是我提供的手写稿中习惯性的一些写法，当时用字钉排版的人不好识别，还真不能怪“手民之误”。

更让我骄傲了一阵的是，这篇文章又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K5）》1989年第5期全文复印了，这至少说明学报刊用此稿并不完全因为我是校友，也并不完全因为有王明元老师的推荐，文章本身在当时还是有其一定的贡献和价值的。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校世界历史配套教材·近代史卷》（刘文涛、陈海宏主编）还把这篇文章列入了“参考论著”。

1990年7月，我回到母校做了老师。赶的时节不错，两年评讲师，再五年评副教授。那时候，评副高已逐步有了学术要求。我回到学校后把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拆成了4篇，每年在学报发1篇。这些文章篇篇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K5）》全文复印了。幸好那时候没有要求A、B、C级，学校并没有歧视自己的学报不“核心”，也正是基因于此，我一直感念于心，完全可以说是这本学报成就了我的进步。后来，再五年，评教授，这方面的要求已越来越“高”。根据这些年的评价体制，学报没有进入所谓的“核心期刊”目录。出于学校的职称评审文件和科研奖励文件的导向，老师们为了评职称、为了科研奖励，优秀的论文不再交给学报，加之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学术生态，于是外校的优秀稿子也不投到学报来，学报的稿源自然也就不理想了。尽管如此，凭着对学报的感情和自己的钟爱，我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学

校的任命。

二

2011年6月，我到学报编辑部上班。10月，学校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由历史文化学院吴佩林教授领衔申报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获准立项。于西华师范大学而言，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零的突破。整个学校都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我兴奋的是，这对学报也应该是一个机会，于是主动申请与项目组合作，在学报上开办一个专栏。上下左右，众皆响应，“地方历史文献研究”栏目应运而生，并在2011年第6期上以4篇论文的“阵容”正式启动，且留下了如下的“编者按”语：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更新，在学术资源的利用上，近些年来的传统文史研究者们已经跳出正史、政书等传统文献空间，深入到了地方出土文献、档案、方志，甚至是民间的族谱、碑刻、契约与账本等地方文献领域，史料与方法多元化的特征日益凸显，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

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西华师范大学数十年稳定的学术方向，涌现了诸如赵吕甫、李耀仙、龙显昭、胡嗣坤、杨世明等一批在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近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此学术领域的繁荣，本刊特专设“地方历史文献研究”栏目，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惠赐鸿文。

本期编发“南部档案”专题研究论文四篇，涉及清代南部县基层区划、南部县乡约的废除、清代书吏以及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相关理念等课题，欢迎学界同道参与讨论。

此后，每年第3期、第6期刊发此专栏（按：从2012年第6期起，栏目更名为“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文章。如今，已五年余，前后已刊文50余篇。检索这些论文，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以地方历史文献为对象和依据的学术论文，居多的还是基于地方历史文献而进行的历史解释。但根据文献本身性质的不同，又可分成若干类型：

其一，以南部档案、巴县档案以及方志、契约、族谱之类地方文献等为依

据而对若干历史问题进行的解释性研究。这 50 余篇论文中大多数属于这一类，本书选的也大多是这一类。

其二，对历史上留下的书面文献进行的考证性研究和文献价值评估，如《周洪谟现存著作考论》《〈乐庵语录〉辨证》《郭允蹈〈蜀鉴〉略论》《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同治增修南部县志〉略论》《皇甫录及其〈下俾纪谈〉述论》等。

其三，对金石文献的校读整理和考古研究，如《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 Y0067〈佛说随愿往生经〉校录考订》《四川营山〈大蓬秀立山普济寺众修十王生七斋记〉校录整理》《广安冲相寺“唐代石刻导游图”辨误》等。

其四，对地方历史文化名人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考辨、整理与研究，如《蜀中隐逸杨甲仁心学思想述论》《试论司马相如的学术思想》等。

其五，关于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的学术综述，本书精选了 3 篇。

其六，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学术书评，如《“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升华”——读吴佩林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

限于篇幅，恕不能将这 50 余篇论文完整呈现，待他日第二辑、第三辑及以后各辑的推出，再行以相应的主题结集奉献。

三

以笔者愚见，本书所集之论最能体现历史学之本质元素和要求，一史料，一解释。

“历史学家靠文献来进行研究。……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①确实，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是史家认识和重建过去的中介；没有史料，就无从谈及治史，也就等于没有历史。

就字面泛解，治史过程中使用的资料即为史料。梁启超界定，“史料者何？

^① [法] 朗格诺瓦、[法] 瑟诺博司著，余伟译：《史学原论》第一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页。

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德国历史学家保罗·基恩1947年表示，“我们把可以从中获知关于过去之知识的所有文本、研究对象和事实都称为史料”^②。今中国学者李剑鸣先生言，“凡治史过程中使用的研究性文献和常识以外的资料，都属于史料的范畴”^③。

中国古史，“六经皆史”，刘知幾《史通》概史著为二体，一当时之简，一后来之笔。当时之简，是当时人的记录，后来之笔，是后代人的概述。当时之简又析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这可能是我国古史中关于史料最有影响的理论总结了。催生近代中国“新史学”的梁启超亦分史料为“具体史料”与“抽象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其二分史料为“文字记录以外者”“文字记录者”更为详备。“文字记录以外者”略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三类，包括“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实物之模型及图影”；“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④。19世纪末有西方史学方法论鼻祖之称的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1854—1937，亦译伯伦汉）将所有的史料分为传说与遗迹两类，“凡事故方面所直接遗留至今尚存在者，谓之遗迹；其由事故方面传说而来，经过人之观解而重复述出之者，则谓之传说”。其所谓遗迹，则包括遗物、文件书契、纪念物品等等；其所谓传说，分为图画的、口头的及文字的三种^⑤。这种史料的二分法，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很大。西方整套的近代历史研究方法，奠基于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的划分此疆彼界，可见此种分类的重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50页。

② [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③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37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7、102、51—79页。

⑤ [德]伯伦汉著，陈翰译：《史学方法论》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0—191页。

要性。发动了 20 世纪“法国史学革命”^①的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亦分史料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两大类，即可见一斑^②。所谓“有意史料”是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无意史料”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如果说梁启超的论述全然取自西学脉络^③，那么联系早此 1000 多年前刘知幾即作此分，当叹服刘公见解的卓越，亦足证中西史学之相通^④。历史学的特性如此。

欧美古代史家著史，大多倚重史诗、档案和其他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的传说和见闻。近代科学历史学创立以来，兰克治史，但求“陈述历史的真况”^⑤，以注重档案文献和史料考订著称。公私档案、碑刻铭文、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是 20 世纪中期以前欧美史家所利用的基本史料。这种史料观，也是民国时期创立的史语所所推崇的。1928 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为中国史家所塑模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⑥，他把史语所的同道就称为“中国的兰克学派”^⑦。对于当下中国学者而言，傅斯年的口号与主张大多耳熟能详，如“史学即史料学”，“不谈史观，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史家的职责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那个时候，中国持此论者还多，比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⑧如此等等。

傅斯年的主张本是针对不重史料而放言空论的不实学风而崇尚“实学”。可

① [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②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第 48—49 页。

③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30 页。

④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10 页。

⑤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30 页。

⑥ 同上书，第 132 页。

⑦ 朱渊清：《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载傅斯年著，朱渊清导读：《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导读”，第 6 页。

⑧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9 页。

叹，现在的史学界，傅斯年的口号，很多人都能朗朗上口，但并不能照此治学的研究者却大有人在。只看到个别的材料，就试图推断一般性的结论；没有深入钻研史料，就敢于发表“新”观点；仅仅读了几本书，就言称要建构新的史学解释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距离傅斯年的主张好几十年之后，韦庆远即曾指出：

前一个时期，我们史学界存在过一股不正之风，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拒绝在反映历史事实的原始资料上下苦功，到写文章时现找几条二手、三手的资料点缀一下，于是便放言高论，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论犹可，愈论愈加深混乱，离开历史真实愈来愈远。人们戏称这种学风为“回锅肉史学”，因为它不过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再加点佐料，回一下锅而已。也有人戏称之为“议论史学”，因为它除了空发议论之外，实在并没有在史学研究上做出任何真正的贡献。^①

又30年过去了，“回锅肉史学”成果有增无减。“学术”著作、论文的体量大多了，但立足史料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比例却越来越小。一百多年前，英国史学家F.约克·鲍威尔（F. York Powell）曾说，“大量的垃圾已经阻碍了知识的进步”^②，一百多年以后，这句话恐怕也并没有过时。笔者近几年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即常有制造学术垃圾的内心自责。

于中国史学而言，这恐怕也有“传统”的无奈。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举世著称^③，但史料的毁损恐怕也是著于世、著于史的。欧洲各国历史资料也屡遭毁损，但大多是天灾或战乱所致^④；进入现代以来，欧美各国保留的历史记录

① 韦庆远：《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

② [英] F.约克·鲍威尔：《致读者》，载[法]朗格诺瓦、[法]瑟诺博斯著，余伟译：《史学原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③ 美国著名学者、汉学家亚瑟·瑞德（Arthur Wright）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见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

④ 价值无比的古罗马帝国政府文件连同成堆的文学、历史手稿曾在蛮族入侵之时毁于一旦。多少历史纪念馆和档案库在两次大战中被夷为平地。法军溃败之时，人们故意把军事文件烧为灰烬。历史悠久的圣·贝洛特·卢瓦尔大教堂的档案曾遭到四次火灾和一次抢劫。见[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7、59页。

日趋完整，特别是公私档案、手稿以及地方记录愈益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中国历代文献除了毁于天灾和战乱之外，因人祸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历代的当权者出于私欲或无知，毁损文献，如祖龙之虐、江陵焚书之类，图籍浩劫不绝于史^①。梁启超曾说，中国历代被毁文献中，以史书居多。这一“历史”也留下了不少“历史之谜”，比如郑和远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至今仍然未解，原因就在于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有意将郑和远征的记录销毁了^②。正是由于原始文献损毁亡佚，保存于正史中的有限史料，才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的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③虽然“正史最重要之性质为保存材料”，但事实上，正史保存的史料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多有删改讹夺，在价值上与原始史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试看马班以后诸纪传史家，那一位不是在那里抄实录，抄碑传，那一位曾经充分利用过直接材料？”^④正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⑤，中国历代“国史”“皆以史官所记为本”，事涉君亲，必有隐讳，以是历朝国史不可能有信史，或不可能完全是信史。

但在欧美史学界，“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之别是分明的，这种“正史”虽不见得不可作为史料，但是没有我们国史的那种“史料”地位的。英美史学界常用 sources 指称史料，有时也用 documents，或者连用 sources and documents，分 primary sources、secondary sources，我们译为“第一手资料”、“第

① “康乾以来迭兴文字狱，再申禁书之令，其惨酷直为前史所未闻。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录，不惮一改再改，对于明清之间的史料，不惮为大规模的焚毁。据兵部报告，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销毁次数计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此项禁令至乾隆五十三年尚严谕遵行。明清史料在这样禁令下所受的损失，简直是无从估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今为北平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只这焚毁档案一事，可以想见清代阁僚知识的浅陋，而这许多贵重的史料，也几乎轻轻地被这四字断送了。”现在我们所见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当年流散出去也“几乎走到唐山变做还魂纸”。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首本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蔡元培序，1930年。

② 朱京哲：《深蓝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③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④ 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首本，1930年。

⑤ 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42页。

二手资料”，比如朗曼出版公司的 *The Longman Handbook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在每一个专题后面列举参考文献都分三个层次，Sources and documents; Secondary works; Articles。“第一手资料”指的是历史事实发生时期留下的资料（如档案、当事人的日记和书信、实物和各种记录等），“第二手资料”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研究结果，即我们通常说的学术专著。只有“第一手资料”才是史料，“第二手资料”中包含可以转引的史料，但它本身并不是史料。有学者说：“一手资料就是从与问题相关的时代留下的证据。……二手资料是关于问题中的时代的研究，通常出自历史学家之手，有时只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层面，一般都是那个时代结束之后（长久之后）撰述而成。任何令人敬佩的历史研究，必须以一手资料为基础。所以，埋首文献之中是历史学家的要务，就如实验室之于科学家。”^① 随着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经能强烈地意识到“二手资料”的不可靠性^②，因而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如今的中国史学界重视史料尤其是“当时之简”“第一手资料”“无意史料”之类，观念上和行动上都已不是问题。这些年来官方档案的整理与开放、地方文献的发掘与研究，甚至于如沈志华先生之类凭个人之力、用个人之资在海内外广泛搜求档案之类的“壮举”，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对地方文献整理项目的大范围资助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但说到底，还是历史学意识、观念和方法的变化所致。这种变化与“法国史学革命”带给中国史学的影响有关。正如葛兆光先生的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中国大陆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而言是一个分水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史领域关注重心和使用资料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都是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③。20世纪70年代末、80

① [英] 迈克尔·斯坦福著，刘世安译：《历史研究导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126页。

② “浮士蒂尔·德·古朗治毕生研究它所谓封建制度的‘起源’，我恐怕他只是提供了一幅模糊的景象，由于受二手资料的错误引导，他给农奴制的起源涂上了一层完全虚假的色彩。” [法] 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③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引言”。

年代初开始，国内的《法国史通讯》《国外社会科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世界史研究动态》等刊物逐渐将“年鉴学派”翻译介绍进来。张芝联先生1978年于《法国史通讯》第1期发表的《法国年鉴派史学》一文是国内学界年鉴学派研究的开山之作^①。尽管年鉴学派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但就西方史学而言，1955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直接或间接地发端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新思想才开始充分发挥影响”，“费弗尔终生‘为历史学而战’，但是，1955年却是这场战斗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年”^②。当然，到20世纪末，年鉴学派经历三个阶段之后，已经完成“从阁楼到地窖”到“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但“对于中国文史学界来说，年鉴学派发生最大影响的东西，还是第一阶段的那些理论和方法”^③。

年鉴学派纲领的核心所在是坚持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这种拓展最直接地体现在重视过去历史学并不注意的很多问题，比如自然环境、地理变迁、身体、健康、医疗等等，与之相关联的自然就需要拓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联系，相应地，也就开辟了更广泛的历史学资料范围。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问题，那就是提出问题^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⑤只是，所谓史料也原本是抱有不同目标、不同观念的人的“陈述”，偏见与误读如影随形，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历史学家既可能迷失在材料的迷宫中，茫然不知所措；也

① 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7页。

②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3、54页。

③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6页。

④ 王加丰：《试论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⑤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4—56页。

可能误入意识形态、观念预设、逻辑悖论、个人好恶的歧途，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一无所获。人们缺少的不是历史，而是发现历史的眼睛。我们这个时代拥有太多的成果与课题，却太缺少“问题”，尤其是新问题。学术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部问题如何提出、衍生、变化的历史，学术由于有了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取代被认为已解决的问题以及被证明不是问题的“伪问题”而取得进步，问题的新陈代谢是学术向前发展的动力。但提问题不仅是“纯学术”的事情，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①。正是视野、角度和方法的创新，才铸就了辉煌的“法国史学革命”，以至于“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②。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识认西方近代史学肇始于兰克，最重要的原因是兰克建立了一套有规可循的史料批评体系，且以身作则在实际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③，年鉴学派观念中，历史学家“主要的兴趣还是搞清史料，让史料说明问题”^④。如今世界的历史学发展，相对于客观主义史学而言，西方后现代史学反“实证史学”，行“语言的转向”，否认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一个基本的依据就是，史家所依据的史料本身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它不仅包含着记述者的偏见、局限和误解，而且只是一种与客观实在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形式；因此，依据史料而撰写的历史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类似文学的“想象”的产物。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逻辑，史料中不一定包含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史家运用这样的史料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纵向地看，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当然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以“革命者”的形象而出现在史坛的，但是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只是一种

① 韦兵：《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读书》2006年第7期。

② [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导论”，第1页。

③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97页。

④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扬弃”，并不全面否定史料的考证，唯此才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进步。若如后现代史家所主张的那样，极而端之，“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完全切断“文本”与“过去”的连锁，进而轻视史料，撇开史料对解释的制约，否认史料在史学中的核心的和基础性的地位，恐怕会从根本上颠覆史学存在的正当性，史家“所建立的历史，必将化为子虚乌有的符号游戏，而别无实指”^①。

但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所评论的：“从很多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冷嘲热讽的，甚至是绝望的世界观，在其最极端的形式里几乎没有一般所知的历史学的容身之处。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提出有关真实性、客观性、历史学的疑问，都不可置之不理。”^②这种新的“史料”观念，重新界定了史料的性质，打破了对史料的轻信乃至迷信，对于史家更谨慎地利用史料无疑是富有启示的。

承认谨慎地利用史料，当然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抛开史料的历史学。本来，人之为人，在于有记忆的需求，恐惧失忆。只要承认人类有必要了解和记住过去，就不能否认史学存在的必要性。学界通识，治史贵在求真^③，亦难在求真，往往“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所指”^④，求完全的“真”是不可能的，这恐怕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感叹历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⑤的原因之一吧！写出的史书与当时的真正的历史，总不可能一模一样，但求其尽可能地接近真，则是可能的。史家常常皓首穷经，倾其一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梳耙

①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8页。

②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美]林恩·亨特、[美]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8—179页。

③ 诚如近代史学的先驱者——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在《历史批判辞典》中所言，“真实乃是历史的灵魂”。倘若缺乏“真实”，历史就算写得尽善尽美，亦只能介于“寓言”与“传奇”之间，却绝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转引自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1页。

④ 钱钟书：《汪荣祖〈史传通说〉序》，载《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64页。

⑤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页。梁启超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考证，正是为了求其“真”。史料固然存在种种缺陷和局限，但试想，除了史料，还有什么其他更可靠的材料可以帮助史家“真实”地了解 and 解释过去呢？确实，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世间没有比史料更有用的依据；依据史料所撰写的历史固不完全可信，但抛开了史料就根本无法写出任何历史。史学要存在，除了依靠这种并不完美的史料，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史家还是得一门心思地找史料。对历史学而言，“惟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①。

所以，恐怕不能否认后现代史学观念对于我们甄别和使用史料确有方法和意识上的借鉴意义，但史学还是要以史料为基础的，“史料的尽量扩充”始终是必要的。基于此，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是值得推介的，也是应当鼓励的。本书所集辑的论文中的“史料”多属档案、文书、契约、族谱之类地方文献，这是史学的坚实基础，一如蔡元培云：“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②

本书集辑之文所依据的档案，主要是《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简称“南部档案”）、《清代巴县衙门档案》（简称“巴县档案”）等等。南部档案近年来蜚声海内外，与西华师范大学南部档案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南部档案”2003年10月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次年12月被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此档案的珍贵在于：其一，它是目前发现的历时最长的清代州县档案；其二，它是档案数量在一万卷（件）以上的唯一一种仍按“房”归档保存的清代地方档案；其三，档案数量在目前发现的清代地方档案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巴县档案；其四，档案文种齐全，涉及内容广泛，具有极高的档案学、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法学研究价值。此档案最早存于南部县公安局，移交南充市档案馆后，1965年春、20世纪70年代末、1984—1986年先后进行了三次整理。自2005年起，西华师范大学与南充市档案馆通力合作，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资助下，开始对这批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整理、著录。这是对

① [法] 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② 蔡元培：《〈明清史料〉序》，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首本，1930年。